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及其檔案遷臺

王文隆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

摘要

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曾為臺灣地區三大民國檔案典藏與史政機構之一，與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齊名，其基礎就在於從中國大陸遷臺的史料為基盤的豐富典藏，以及自中國大陸遷臺的研究、修纂人員，完備了中國近現代史的論述。

黨史會的遷臺，使臺灣仍有足夠資源能推動中國現代史論述的建構，並使此論述成為國內廣為人知的主軸，因此該單位遷臺的歷程頗值得探討。本文發現，黨史會遷臺的歷程，多借鏡抗戰時期黨史會西遷重慶的經驗，而史料及人員遷臺，實有中國國民黨蔣中正總裁的直接指示。

本文將利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資料，搭配國史館的相關資料，政府公報及報刊報導，重建當時的脈絡，還原歷史。

關鍵字：黨史會、國史館、遷臺

壹、前言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遷臺，史料方面來說，1949年黨史史料自大陸遷臺，不僅其質與量遠比國史館遷臺時大得多，也因為中華民國的創建和發展與中國國民黨息息相關，使這批資料存臺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在臺闡釋歷史論述的珍貴素材。此論述在國內歷史教科書中能多沿用，普遍承認中華民國的建立，與興中會、同盟會頗具關聯，而承繼同盟會的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以及爾後的中國國民黨，也多佔於中國現代史論述的主脈絡。又由於中國國民黨長年執政，更使得這樣的歷史論述透過教育、媒體、展示而廣為人知。闡釋此一歷史論述的重要依據，就是中國國民黨保有的歷史材料，造就「少了國史不成黨史，少了黨史不成國史」的緊密關聯，而參與論述建構的史學界前輩，也多利用黨史會所藏的史料為本，加以闡釋。因此，黨史會遷臺是1949年前後相當重要的事件之一。

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曾經出版的《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中，有兩冊收錄黨史史料編纂工作報告，時間起自1930年，終於1950年遷臺之初。其中關於黨史資料來臺之後的情況，簡單地以「詎甫兩年，共匪擴大叛亂，政府一再播遷；際此之際，經本會全體員工同志之努力，克服種種困難，得將全部史料，由京而穗；輾轉運臺，毫無損失，良足慶幸！」¹一段話來描述1949年，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黨史會）史料搬遷的情形。而黨史會成立60周年時所出版的《汗青一甲子》也持此論，以寥寥數語帶過。然若連結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網頁，卻能發現到，現下該館開放的資料中，不乏原屬中國國民黨的黨務資料，如宣傳部與秘書處的史料，這不免對黨史會將史料全數運臺的論說產生疑竇。²

* 本文撰寫期間，感謝本會前輩蔣永敬老師、李雲漢老師提供建議，並對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表達謝意。

1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6）（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頁595。

2 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利用處，〈現行查檔範圍〉（2013年12月），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網站：www.shac.net.cn/cdzn/xxcdfw（2015年5月9日點閱）

以往針對政府遷臺的研究，多集中於政府單位，對於中國國民黨遷臺的過程，多夾帶於政府遷臺的過程帶過，常不會是焦點，對於黨部所屬單位或所管資料的遷運，則談得更少。

黨史會如何遷臺，這批黨史資料是如何被揀選，被揀選後的史料是如何搬遷來臺，人員又是如何辦理？來臺之後又做了如何安頓？以往，對於這段過去，僅能憑黨史會出版品的簡單描述，對於相關細節的爬梳並不充足，因此本文將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資料，搭配國史館的相關資料，政府公報及報刊報導，重建當時的脈絡，還原歷史。

貳、黨史會的成立與抗戰前後搬遷概況

中國國民黨對史料的保存，以及歷史詮釋的關注，較其他政黨來得重視，這或許與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重視歷史有關，黨史會的成立就是他參與倡議的。

一、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的成立

國民革命軍在1928年6月克復北京之後，奉系退往東北，戰事還在進行，不過大勢底定。蔣中正、丁惟汾、陳果夫等委員，假1928年8月4日舉辦的中國國民黨第2屆5中全會，提出設立黨史編纂機構的提議。該議雖經通過，但未及實施。

待東北易幟，北伐結束，中國國民黨召開第3屆全國代表大會。有鑑於黨史為精神所託，能策勵後人、鑑往知來，為保存國史與黨史，乃於1929年3月18日，中國國民黨第3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次全體會議中提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下，增設黨史編纂委員會。是議經同年12月26日，由中央秘書處草擬黨史編纂之意見暨黨史編纂委員會組織方案，呈交第3屆第60次中常會通過，推蔣中正、吳敬恆、王寵惠、胡漢民，鄧澤如、古應芬、

戴傳賢、邵元沖、葉楚傖、林森、張繼等11人為委員，訂立組織大綱與組織系統圖。³該議復經第3屆第73次中常會通過，增聘陳少白、蕭佛成、張靜江為名譽委員，又復推林森、胡漢民、葉楚傖、邵元沖為常務委員，並改名為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為中央所屬特種委員會之一，人員與史料集中管理，下分徵集科、編輯科、總務科、史料檔案庫與史料陳列室，其中史料陳列室具有對外陳展功能。⁴中央賦予黨史會徵集、抄錄、整理黨史資料的責任，要一般民眾與新進黨員瞭解黨史。成立之初，以中央僑務委員會遷移後所留下的館舍辦公。

隨著業務不斷擴大，編制補滿之後，空間不足，加以黨史會負有對外陳展的任務，必須有足夠的空間提供展示。因而在1934年元旦，由邵元沖、王正廷等委員提議，由林森、孫科、葉楚傖、張繼、孔祥熙、邵元沖等人擔任建築委員會委員，推林森擔任委員長，定址於南京中山門內明故宮西側中山東路，修築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永久館所。⁵新館名為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於1936年7月完工，黨史會於完工次月接收辦公，在雙十國慶舉行落成典禮，對外開放。⁶1937年1月根據中央擴大組織的決定，改常務委員制為主任委員制，將各科庫擴大為處，改為編輯處、徵集處、檔案處、總務處等單位，由邵元沖擔任首任主委。惜因邵元沖在西安事變中殉難，乃由張繼繼任。⁷

3 「三屆中常會60次會議紀錄」（1930年1月8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3.3/82.1。

4 「三屆中常會73次會議紀錄」（1930年2月13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3.3/95.1。

5 〈黨史史料陳列館 馥記公司得標築費三十萬 俟中央指撥具領後即興工〉，《中央日報》，1934年12月25日，版7。

6 〈黨史陳列館建築落成 系宮殿式富麗堂皇設備完善 屋分四層建費念萬日內驗收〉，《中央日報》，1936年7月9日，版7；〈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 今午舉行落成典禮 卅餘年革命史蹟分七室陳列 公開展覽歡迎各界前往參觀〉，《中央日報》，1936年10月10日，版7。

7 「中央黨史會主委邵元沖在西安遇難遺缺推張繼繼任案」（1936年12月29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5.3/31.6；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年），頁128。

二、西遷重慶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淞滬會戰期間，日軍於15日派軍機轟炸南京。張繼為求黨史史料的安全，下令將黨史會史庫所管重要史料33箱，以汽車裝運至蕪湖，取道水路經九江、漢口，於8月23日抵達長沙，暫存於張輝瓚墓廬。接著，於同年8月25日開始第2批史料裝運，計得78箱，交輪船招商局江華輪裝運，於同月28日抵達漢口，轉鐵路運至長沙與第1批史料會合。史庫所藏較不具史料價值的普通刊物與報紙，則暫存不動。⁸承辦整體遷運規劃的，是時任主任秘書的徐忍茹。

1937年11月，戰事逼近南京，中央決定內遷，黨史會同仁亦轉往長沙。南京淪陷後，1938年元旦，黨史會復押運史料自長沙轉往漢口，存於平漢路特別黨部，後洽商民生公司所屬民貴輪載運至宜昌，再委三北公司富華輪運至萬縣後，換乘昌興輪抵達重慶，暫存於民生公司物產部推棧。為使史料有穩妥空間存藏，史料暫存期間，黨史會同仁出外覓尋適當場所，經民生公司經理鄭碧城介紹，將史料暫存於北培紹隆寺。然因紹隆寺離市區較遠，加以當地頻有股匪，乃於1938年10月初再移至沙坪壩對岸，江北縣屬磬溪培園。⁹1939年5月，復為避免日機轟炸重慶波及史料，再將史料遷至巴縣山洞附近的亞光寺，存於山洞中，人員仍留磬溪培園辦公。¹⁰此外，為了保障史料安全，也著手將珍貴史料攝影複製，分地儲藏，以免遭遇轟炸，使所有資料毀於一炬。¹¹人員與史料一改在南京集中管理的辦法，轉以人員史料分離的措施，並開始重要史料複製工作，作多重保險，以免青史盡成灰。

抗戰期間，黨史會除了徵集與保留總理、總裁與創黨時期史料之外，

8 劉偉鵬，《汗青一甲子》（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0年），頁36。

9 「五屆五中全會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工作報告（1937年8月至1938年12月）」，收於：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6），頁500-504。

10 劉偉鵬，《汗青一甲子》，頁38。

11 「五屆五中全會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工作報告（1937年8月至1938年12月）」，收於：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6），頁505。

另訂立〈抗戰史料徵集簡則〉，自1938年8月起，奉蔣中正口諭指示加徵抗戰史料。¹²八年期間，共得抗戰史料26,479件，分為雜誌、專著、戰鬥情報、圖片、畫刊、報紙與抗戰宣傳品等類，為這段時間徵集史料最大宗。¹³

三、還都南京

黨史會西遷之後，原黨史史料陳列館被敵偽接收，陳列館後方土地所建房屋被拆除，修建為汪政權中央軍校營房，共有31幢。1945年8月抗戰勝利，黨史會成立還都委員會，辦理還都事宜。同年10月17日，黨史會派員前往南京接收原為黨史會所轄的黨史史料陳列館。按理說，既然該土地原屬黨史會，便應由黨史會人員接收，物交原主。然因戰爭結束之後，各地普遍發生軍政單位接收混亂的情況，加以該處房舍曾屬汪政權中央軍校，便為總統府警衛總隊先佔利用。幾經交涉，總統府警衛總隊方於1946年8月讓還2幢，黨史會沒能全數爭回。¹⁴

還都空間大致確定後，黨史會作重回南京的準備之外，對於史料的運送與接收也有所規劃。黨史會在此期間，史庫徵集存藏史料大為增加，除了原藏於南京的重要史料之外，還增加了汪政權史料與抗戰時期各機關史料。

西遷史料運返南京，啟動時間在1946年5月6日，以抗戰史料為主的第1批黨史史料共118箱，由軍車裝載，自重慶取道川湘公路，經綦江、南川、彭水、黔江、永綏等地運抵湖南沅陵，再轉常德乘船南下，於同月26日抵達南京，轉運史庫存藏。以珍貴黨史資料為主的第2批史料共234箱，於9月11日採水路沿長江，經萬縣、宜昌順流而下，同月21日運抵南京下關，隨

12 〈教育部訓令第6906號：奉行政院令為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徵集抗戰史料一案轉飭遵照〉（1938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報》，第10卷第9期（1938年9月），頁14。

13 劉偉鵬，《汗青一甲子》，頁45-47。

14 「六屆三中全會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工作報告（1946年2月至1946年1月）」，收於：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6），頁623；關於抗戰結束後接收亂象的檢討，能參考：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25-50。

即運送入庫。待史料進庫，黨史會開始整編復舊工作。¹⁵除了運自重慶的史料之外，黨史會復歸南京的另一史料來源，是接收而來，有汪政權中央黨部黨史會所存藏的三萬餘件史料，代為接收的汪精衛國史館史料二萬餘件，以及書籍刊物九萬餘件。¹⁶

另一批史料來源，是黨史會接收抗戰期間西遷機關資料而來，這批檔案可說是搶救來的。抗戰勝利之後，對政府來說，除了接收淪陷區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辦理還都，然而還都工程浩大，搬遷費用亦高。行政院雖在1945年9月4日發布通令，要求各機關依據〈各機關保存檔案暫行辦法〉，填造清冊，將不需永久保存的檔案移存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減輕還都運輸負擔，然許多單位仍逕將視為無用的過期檔案銷毀。¹⁷眼見檔案浩劫即將發生，黨史會主委兼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主委張繼，於1945年12月呈請蔣總裁同意在渝設立黨史會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聯合接收辦事處，設主任1人總理事務，由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派任副主任1人，黨史會派任辦事員3人組織，如需擴編人員，得由黨史會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商定派任或臨時雇用。¹⁸該聯合辦事處的任務是接收重慶國民政府所屬機關無用之機關舊檔，接收完畢之後建立清單，運往南京統一度藏，開辦費用需820.16萬國幣。¹⁹至1936年10月止，該辦事處獲得各機關檔案1,000件，分裝600箱，於1948年2月經江運送抵南京，類分為黨務與國政兩種，分交黨史會與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度藏，另也接收行政院、軍政部資料，待工作到一段落，於1948年3月

15 另有資料顯示，自重慶運南京的史料箱數為352箱。詳見：「曾介木簽請移交史料箱一冊」（1946年5月16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史料》，檔案號：史35/61.8。

16 「六屆三中全會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工作報告（1946年2月至1946年1月）」，收於：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6），頁622-623。

17 「國民政府訓令338號」（1945年9月4日），〈政府機關檔案保存移轉辦法〉，《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70-0007，入藏登錄號：001000000811A。

18 「吳鼎昌呈蔣主席」（1945年12月10日），〈政府機關檔案保存移轉辦法〉，《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70-0007，入藏登錄號：001000000811A。

19 「黨史會與國史館接收黨政軍各機關檔案辦法草案」（1946年3月9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42.2。

左右結束。²⁰行憲之後，國史館依據〈總統府組織法〉轉隸總統府。這段期間，黨史會與國史館頗有推動合併的可能。

參、黨史會的遷臺準備

國共內戰在抗戰結束後不久爆發，一開始主戰場多在長江以北，中共在蘇聯的援助下，將國軍逼往困局，至1948年年末起，各機關多有疏遷準備。

一、黨史會與國史館合併的規劃

黨史會的成立，正逢國史館業務沒落之時。國史館原是依據中國歷朝後代修前代史的慣例，在民國之後承接清朝國史館。北伐結束之後，因國民政府內並無該組織之編制，業務停頓，國內史政機關乃以黨史會一枝獨秀。直到1939年2月，因中國國民黨5中全會討論建立檔案總庫、籌設國史館，方於國民政府組織下設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由黨史會主委張繼擔任籌備委員。²¹另經中國國民黨第5屆中央委員會第8次會議，由張繼等委員提出建議，要求將廢存檔案收歸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管理，經軍事委員會同意中央設計局所擬〈各機關保存檔案暫行辦法〉，轉請國民政府備案，通令國民政府所屬機關，凡機關廢存檔案需通知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審視，毋須保存者方得焚毀，給予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徵集政府檔案的權力。²²然或許受

20 〈國史館與黨史會接收檔案工作〉，《中央日報》，1948年2月23日，版4。

21 籌備委員還包括：鄒魯、葉楚傖、鄧家彥、王伯群、楊庶堪、胡毅生。詳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國民政府渝檢機字第307號函」（1939年2月13日），〈國史館沿革史（二）〉，《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222-0002，入藏登錄號：001000002173A；「國民政府文官處致國民政府秘書處渝文字第148號函」（1940年1月9日），〈國史館沿革史（二）〉，《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222-0002，入藏登錄號：001000002173A；〈國民政府訓令渝文字第264號：國防最高委員會函為核定國史館籌備委員會開辦費暨29年度經常費概算案令仰轉飭查照由〉（1940年3月13日），《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240號（1940年），頁13。

22 「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處致國民政府文官處國紀字第17576號函」（1941年4月30日），〈政府機關檔案保存移轉辦法〉，《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2070-0007，入藏登錄號：001000000811A。

限於戰爭狀態，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在成立之初，所收的資料數量並不多，且無合適空間存置。抗戰勝利之後，〈國史館組織條例〉於1946年11月11日通過，國史館正式成立，隸屬國民政府，後於1947年1月20日在南京開館，由原任國史館籌備委員會委員的黨史會主委張繼擔任首任館長。²³張繼同時擔任黨史會與國史館之最高行政長官，且推動兩單位共同成立接收辦事處之舉，就有深化兩單位合作的意味，更深的一層結合在兩單位經費的合併上，這與憲政實施頗有關聯。

1947年12月25日憲政實施，國民政府改稱中華民國政府，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結束，黨費自此必須自籌，中國國民黨黨部經費頓減，為減輕黨部負擔，便打算將部份能轉隸國家單位的黨部組織規劃改隸，黨史會列名改隸單位之一，自1948年度起，黨史會預算改列國史館項下，由國史館報列經常費、生活補助費及臨時費等項，唯組織仍隸屬中國國民黨。黨史會預算約占國史館所報預算二成。²⁴依循黨史會改隸政府的規劃，1948年4月，中央黨部預擬編制調整，將可改隸國家機構的黨部組織，如黨史會、撫卹會、黨員通訊局等設法改隸外，中央黨部亦著手分期緊縮編制，以應戰局變化。²⁵1948年11月，經第6屆第168次中常會通過，將中央黨部組織與

23 見〈簡介〉，收錄「國史館」網站：www.drnh.gov.tw/Content_Display.aspx?MenuKey=163（2015年5月7日點閱）；〈國史館組織條例〉（1946年11月11日），《國民政府公報》，第2682期（1946年），頁1-2。

24 1948年上半年國史館預算列表：

科目	國史館	黨史會	所占比例
經常費	965,267,500	347,337,500	35.98%
臨時費（房屋租賃）	441,800,000	148,800,000	33.68%
事業費	4,105,280,000		0.00%
生活補助費	4,018,864,000	1,493,004,000	37.15%
總數	9,531,211,500	1,989,137,500	20.87%

詳見：「國史館呈國民政府主席館字第868號」（1947年11月23日），〈國史館經費案（二）〉，《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6322-0002，入藏登錄號：001000002179A；「黨史會鍾孝先等致鄭彥棻函」（1949年5月），〈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198.14。

25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前之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務報告（1945年5月至1950年8月）」，收於：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常務委員會黨務報告》，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17），（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5年），頁635-636。

員額再度緊縮，就現有工作人員中酌留五分之一人力，實施合署辦公，其餘五分之四列為編餘人員，編入勘亂工作隊，不願就編者，一律發給三個月遣散費，返籍回鄉。²⁶

若依據中國國民黨所編〈中央各部會縮編後員額暨現有員額統計表〉來看，黨史會的確不在表內，這與中央黨部規劃將黨史會改隸政府有關。²⁷因此當黨史會人員隨政府南遷廣州時，竟沒有如其他中央黨部所屬單位能有配屬眷舍的基本福利，中央黨部的集會通知也常未寄達，彷彿黨史會已經脫離黨部運作一般。更有甚者，當第6屆第190次中常會通過〈中央工作同志資遣辦法〉時，竟將黨史會屏除在適用範圍之外。²⁸

二、黨史會疏遷

黨史會主委兼國史館館長張繼於1947年12月辭世，會務由副主委徐忍茹代理，但國史館務暫成空窗，雖曾發布戴傳賢與居正擔任館長，但兩人皆未到任。

1948年9月起開始的遼瀋、徐蚌、平津三大決戰，國軍皆嘗敗績，南京岌岌可危，蔣中正不得不考慮如何搬遷重要文物與資產，到安全地方存置。

蔣中正在下野前，規劃國內重要物資疏遷。黃金運臺至少有三批，最早一批是1948年11月底開始裝箱啟運的，第二批在1949年1月，最末一批在1949年5月底運臺。遷運來臺的黃金約有375萬餘兩，成為穩定臺灣經濟的重要力量。²⁹文物的裝運由時任教育部次長，身兼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兼秘書與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的杭立武擔綱，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26 「六屆中常會第168次會議紀錄」（1948年11月24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171.1。

27 「中央黨部縮編問題檢討會決定各項情形」（1948年2月23日），〈政治檔案〉，《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政4/33.1。

28 「黨史會鍾孝先等致鄭彥棻函」（1949年5月），〈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198.14。

29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年），頁50-52。

傅斯年、教育部長朱家驊一起合作，由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外交部組織聯合辦事處，將所藏重要國寶、古物、圖書、資料、文書，去蕪存菁，分3批遷運來臺。³⁰

黨史會所管資料疏遷，與故宮決定遷運的11月10日，相差僅三周。1948年12月1日，黨史會召開第四次例行的工作會報，會中提及戰局逆轉，史料必須做疏遷準備，提請召開委員會議決定疏遷原則，相關經費因黨史會預算已歸國史館填報，也做成黨史會應該派定人員向國史館討論經費的決議，疏遷之事已在醞釀。³¹1948年12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正式函請黨史會準備疏遷，黨史會在收到通知後的第2天召開第13次委員會議，討論疏遷事宜。會中原定將史料循抗戰時期西遷重慶的舊法，利用船運溯江而上，然因位於重慶的庫房已經毀壞，遷往重慶也無適當存藏地點，加以重慶水域在冬季為枯水期，大船無法上溯，需時換運，如遇局勢變化將無法因應，致使重要史料淪失，因此會中決定，要先將史料裝箱，運往長沙。之所以選長沙，乃取其水陸交通便利、物價低廉，往後如需再遷，北往川渝、西入桂黔、南遷粵穗皆宜，相關經費提請中央墊發。³²

三、遷臺史料的揀選與運輸

史料疏遷事宜，除了在黨史會內部預先討論之外，1948年12月17日第六屆第172次中常會，與會會眾提及黨史資料疏遷問題，作成「黨史資料與中央各單位資料交秘書長擬訂辦法呈報常會」的決議，但並未明言疏遷地點。³³次日，吳鐵城秘書長上總裁簽呈，請蔣總裁核示黨史史料與中央各單

30 林桶法，《1949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頁234-248。

31 「第4次工作會報會議紀錄」（1948年12月1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史38/70.4。

32 「第13次委員會會議紀錄」（1948年12月8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史38/70.99。

33 「六屆中常會第172次會議紀錄」（1948年12月17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178.11。

位重要史料播遷何處。³⁴蔣中正收到簽呈後，口諭蔣經國，要黨史會與國史館先估算資料總量後再行定奪。兩單位奉示調查後發現，如黨國資料全數裝箱遷離，將高達4,500箱，運費粗估需要880萬元，規模過大，不得不加以揀選。因國史館成立未久，各政府機關檔案移遷者不多，所藏多為傳記志籍，並不特別重要，而革命史蹟與國民政府時期的重要史料仍多藏於黨史會，估算大約150至200箱間便能裝運完成。蔣經國建議將這批重要史料裝箱資料運往臺灣，由總統府第三局局長俞濟時洽詢海軍部所屬軍艦運送，交臺灣省主席魏道明尋覓適切地點存置，所需費用由臺灣省政府墊付，再由國庫撥還，蔣中正批示：「照運臺灣可也」。此外，關於中央黨部各部門重要檔案，以及政府機關重要史料遺存地點，蔣中正亦批示：「應移臺灣可也。」³⁵黨史會原擬將史料遷往長沙的決議，乃為蔣中正修正，該批重要史料遷臺的方向遂定，由總統府將此決定函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史會，以及臺灣省政府預做準備。³⁶

負責播遷史料來臺的代理主委徐忍茹，抗戰期間擔任黨史會主任秘書，負責黨史資料西遷，他循抗戰時期史料播遷重慶的前例，一則將黨史會所存重要史料先行裝箱，接著再將次要史料裝載，復經篩擇揀選的珍稀與重要報刊與出版品裝運，遺留次要的報刊、書籍、志書等資料在史庫中不動，一則採人員與史料分離的疏遷辦法。基於此一原則，當1948年12月1日召開第4次工作會議時，黨史會便已將總理史料十餘箱先行裝好，其餘列入優先者為先進先烈史料、史稿與貴重文書。³⁷此批重要史料裝為180箱，遵照蔣中正移置臺灣的指示，於1949年1月13日運至下關，交聯勤所屬海

34 「吳鐵城上蔣總裁：黨史史料及重要資料移存地點敬請鈞座指示」（1948年12月18日），〈中國國民黨黨務（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00-0011，入藏登錄號：001000001907A。

35 「吳鼎昌上蔣總裁簽呈」（1948年12月21日），〈中國國民黨黨務（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00-0011，入藏登錄號：001000001907A。

36 「總統府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代電」（1948年12月24日），〈中國國民黨黨務（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00-0011，入藏登錄號：001000001907A。

37 「第4次工作會報會議紀錄」（1948年12月1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史38/70.4。

張輪，於15日起旋出發。黨史會另派李振寬、姚漁湘兩員押運，同月25日在基隆登岸，次日轉搭火車，於27日晚運至臺中，存於臺中市政府內。³⁸次要史料420箱並不先運臺灣，與中央各級單位公物併裝，交招商局執信輪運載，於1月21日在下關裝載，23日啟旋，經上海於同月30日轉抵廣州黃埔港，暫存於廣州中山紀念堂。³⁹黨史會亦依循中央疏遷辦公原則，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于1949年2月1日起，開始在廣州辦公。

戰局逆轉，武漢與上海都在1949年5月淪陷，南昌於次月失守，黨史會遂於1949年7月經第14次委員會議，決定將存於廣州的次要史料重新分裝，共580箱，一併遷臺。黨史會經與聯勤總司令部協商，由其協助派裕中輪船股份有限公司⁴⁰所屬裕東輪載運史料，並派姚薦楠等押運。⁴¹該輪於1949年7月28日自廣州出發，存置廣州的史料遂全數運臺，轉置臺中市政府。⁴²

當時故宮文物與黨史資料俱留存臺中市，或與陳果夫先生和時任臺中市市長陳宗熙有關。陳果夫在1928年時曾經參與黨史會設置的提案，對黨史會的發展頗多關懷。當黨史會資料準備遷臺時，陳果夫身患喉病，聲音嘶啞，仍帶病往見陳宗熙，要求撥借空間供黨史會運用，黨史會乃得暫以

38 「總統府致臺灣省政府函第2543號」（1949年1月6日），〈中國國民黨黨務（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00-0011，入藏登錄號：001000001907A；劉偉鵬，《汗青一甲子》，頁59。

39 「黨史會致中央秘書處天（39）第103號函：為勘得臺中市之大坑鄉及宜蘭縣之羅東為本會皮藏史料處所」（1950年3月7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242.6；「沈裕民呈關於押運史料及檔案公物赴穗」（1949年2月21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史38/69.44。；「黨史會致總統府秘書處留（38）字第1號函」（1949年1月4日），〈中國國民黨黨務（三）〉，《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14100-0011，入藏登錄號：001000001907A。

40 裕中輪船行創立於1937年，地址在上海河南路495號恒利大樓3樓，經理陳在渭。置有裕平輪1艘，於1938年秋被徵用於軍運，在宜昌沉沒。1946年秋，另招新股籌集資金，購入裕中輪1艘（5,117載重噸）。1947年3月，改組為公司，設址南京東路233號，總經理楊志雄。1948年3月，購入裕東輪1艘（載重9,010噸）。1949年上海解放前，兩輪均駛離上海，公司停業。詳見：上海市沿海運輸志編輯委員會編，〈第二節國內航運企業〉，《上海市沿海運輸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年），收錄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421/node67435/node67468/userobject1ai64452.html>（2015年5月24日點閱）

41 「人事室致姚薦楠等留字第195號函」（1949年7月20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檔案號：史38/67.49。

42 劉偉鵬，《汗青一甲子》，頁60。

臺中市政府為中繼。⁴³陳宗熙是浙江奉化人，出身蔣委員長侍從室，與蔣中正總裁頗為親近，1951年卸任臺中市長之後，還擔任蔣中正機要秘書長達18年。⁴⁴此外，他也是主導故宮文物遷臺的杭立武在金陵大學的同學，因此故宮瑰寶疏遷臺中糖廠倉庫，也有他居間牽線。⁴⁵

遺留在南京沒疏遷的黨史會資料，或有相當大一部分為抗戰史料、敵偽史料，以及日常工作所遺留下來的表單、工作底稿、謄寫文卷與摘由單等，通常以部門為單位留存，而重要的總理、總裁與相關圖書典籍、文物，大多遷至臺灣。⁴⁶國史館則因人員與資料未及遷出，政府來臺之後雖在組織架構上仍有國史館之名，但其實際業務都由黨史會代辦。⁴⁷

肆、來臺後的安頓

黨史會來臺，可說是資料一批，人員一批，前後播遷來的。這景況與1937年黨史會西遷重慶頗為類似，以資料先走，人員後至的方式辦理疏遷。

一、人員與史料分散

中華民國政府與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臺之後，仍不免顛波奔忙，加以時局變化劇烈，為策劃史料安全，黨史會亦設法分存，先將500餘箱史料分別

43 李雲漢，〈果夫先生與黨史及黨史會〉，收於：陳果夫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籌備會編，《陳果夫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1年），頁61。

44 蔣中正重用浙江人，能參見：林桶法，〈蔣介石的親族關懷〉，收於：呂芳上編輯，《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1年），頁110-115；周旋華，《財政與外交工作的回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頁66。

45 林桶法，《1949大撤退》，頁50；王丰，《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臺北：商周出版公司，2008年），頁203。

46 「第6次工作會報會議紀錄」（1948年12月21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史38/70.6。

47 〈國史館沿革〉（1998年），收錄於「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web.archive.org/web/19980206010839/www.drnh.gov.tw/ddrh1/ddrh1-0.htm（2015年5月23日點閱）

存置於臺中市政府與位於和美鎮的彰化糖廠，另洽請自南京遷臺的中國農業教育電影公司，代為攝製複本，以備典藏。⁴⁸這複製史料的預備動作，也與抗戰時期疏遷重慶時的做法相類。

在南京時，黨史會的人員編制為70人，為因應疏遷需要，其中有20人或自願疏散，或核准疏散，僅留用50人。其中，3人隨第1批史料派往臺灣，2人在南京留守，2人轉為名譽纂修，1人轉為名譽採訪，其餘42人遷往廣州，眷屬疏遷往湖南湘潭。⁴⁹

1949年4月23日，南京淪陷後，共軍迅速逼近華南。1949年6月，中央黨部決議分地辦公，七成黨工撤至重慶，三成黨工跟隨機關首長行動。公務文卷中笨重且具價值者先行遷運臺灣或其他安全地點，重要且需經常辦公利用者，先行運送至重慶辦事處，最機密或最重要的文件，則由機關首長隨身攜帶。復經同年8月第209次中常會中通過，由青年部倪文亞負責，先在臺北市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設立臺灣辦事處。⁵⁰復經217次中常會，准許黨史會在臺中市政府辦公備案。⁵¹實際來臺的黨史會人員，大概僅有二十餘人，眷屬來臺的也不多。

來臺的黨史會人員有委員兼主委羅家倫、委員兼副主委洪蘭友（未到職），委員吳敬恆、于右任、丁惟汾、鈕永建、王寵惠、鄒魯、李文範、張群、張其昀、王世杰、吳鐵城、張厲生、狄膺。⁵²據黨史會前主委李雲漢先生回憶，除正副主委與委員外，會內各成員分工與職銜一如下附：

纂修：孫鏡（鐵人）、鍾孝先、徐忍茹、梅喬林、姚荐楠

48 喬寶泰、邵銘煌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7）（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2000年），頁129。

49 「第14次委員會工作報告」（1949年5月19日），〈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史38/70.103；「優待遣送家屬名冊」（1948年12月），〈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史38/70.6。

50 陳鵬仁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4）（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9年），頁345-346。

51 「六屆中常會第217次會議紀錄」（1949年9月21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222.1。

52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職名錄》，頁272。

秘書：李治中（1950年8月前）、沈裕民

總幹事：沈裕民（秘書兼編輯室總幹事）、曾介木（徵集室）、徐文珊（典藏室，出任東海大學教授後，由林中俠接任，再轉為張恩柄）、楊毓生（總務室）。

專門委員：李治中、李振寬

採訪：安懷音

編審：楊本章、眭雲章

幹事：劉世景、倪澤澄、項達言、林瓊瑤、崔曾植、王紹易

助理幹事：王伯立、范廷傑、周紹武、唐少鵬、杜仁玉、高子超、羅本初（總務室）

服務員：張邦選、林德、黃桂森⁵³

二、因應空襲威脅疏散

美國在1949年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後，靜待塵埃落定，並未表態支持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然退至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憑藉臺灣海峽天險，在海空軍軍力上遠比中共有優勢，加以轄境實施戒嚴，確實相對安全。

退至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持續仗持海空優勢，拓建舟山群島的海空基地，以空軍轟炸與海軍關閉的方式，企圖癱瘓上海交通。⁵⁴然隨著中共在東南沿海空優的加強，對國內造成壓力，政府擔心共機或將穿越臺灣海峽空襲，便著手規劃第一批疏散計畫。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也響應此舉，基於原存於臺中市政府及彰化糖廠的黨史會所管資料或有被襲風險，考慮疏散，本有意將史料移轉至臺中市大坑山區或宜蘭縣羅東鎮轄太平山林場建庫存置，後經中央黨部於1950年3月中派中央農工部長馬超俊與中央監察委

53 李雲漢，〈李雲漢致王文隆函〉（2015年7月30日，未刊稿，王文隆藏）。

54 關於中華民國空軍轟炸上海，能參見：《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中共上海黨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1年），頁49、237。關於海輪截捕與關閉政策，能參見：林宏一，〈封鎖大陸沿海——中華民國政府的「關閉政策」，1949-196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員會秘書長狄膺在中臺灣訪查。⁵⁵史庫修建與否，實際上有一些爭論。第六屆第229次中常會中，狄膺以空襲為旦夕之間，而史庫修築不易，對於是否興築，頗表疑義。⁵⁶會中甚至有提議將黨史史料移存外國者，意見分歧，蔣總裁乃指示：「史料不能移存國外，決在臺灣建庫保藏。」⁵⁷史庫修建爭議經總裁批示後方消，黨中央決定在臺灣建庫存藏資料，敦請行政院撥付經費新臺幣10萬元，擇定臺中縣霧峰鄉萬斗六山建造史庫，此一重任因代理主委徐忍茹身體情況不佳，交由李敬齋繼任代理主委續辦。⁵⁸

黨史會遷臺初期，經費的核撥似乎仍不是來自黨部。1950年4月間，中央黨部討論黨務經費預算每月經常費用時，除原定的24萬之外，核定撥下新臺幣14萬元，交組織、宣傳、青年、農工、海外、婦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處等八個單位平均分配利用，未見黨史會列名分配。⁵⁹因此修建史庫的經費由行政院核撥，符合當時規劃將黨史會與國史館合併的脈絡。直到1950年年末，中央改造委員會編列1951年年度預算時，黨史會在事業部分的預算方再度出現，一整年有16萬新臺幣，佔整體事業費預算999.95萬新臺幣的0.16%。⁶⁰復經1952年10月，由羅家倫在中國國民黨改造完成，確認黨史會仍續留黨部組織後，提請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將黨史會在職同仁補予任命並追認服務年資。⁶¹至此，雖說黨史會在政

55 「中國國民黨致行政院臺(39)秘會第1046號函：為常會決議在萬斗六山中建造皮藏黨史庫房，約需經費新臺幣10萬元，請惠予籌撥」(1950年5月15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242.3。

56 「六屆中常會第229次會議紀錄」(1950年4月6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234.1。

57 「蔣中正日記」(1950年4月6日，未刊本)，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58 「六屆中常會第229次會議紀錄」(1950年4月6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234.1。

59 「39年度黨務經費預算及事業費等增列審查」(1950年4月20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235.8。

60 「中改會40年度總預算」，〈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42/183.1。

61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概況〉，收錄：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2冊(臺北：國史館，1981年)，頁439；〈致張其昀函〉，收錄：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第7冊(臺北：國史館，1981年)，頁305。

府遷臺之後代辦國史館業務，凡政府宣付史館立傳案皆由黨史會存辦，但國史館與黨史會合併的計畫，才能說是完全停頓。

黨史會史庫建成之前，基於保障史料安全的目的，史料疏散分存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里民會所、洪家祠堂（現洪氏家廟），以及文昌廟（現登瀛書院）3處。因臺灣雨多潮濕，史料暫存地紛紛發現白蟻蹤跡，便決議在史料存藏的3處地面鋪上三合土，三合土上墊磚石再架枕木，將史料堆疊於塗抹防蟻油之枕木上，牆面粉刷水泥或石灰，或是噴灑DDT以防杜蟲害或白蟻啃食史料。⁶²然而長久之計，還是必須修建史庫，才能保障史料安全。

隨著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改採臺海中立化政策，宣布第7艦隊協防臺灣海峽，且使美援轉運臺灣，使得臺灣局面轉危為安。1950年7月26日，中國國民黨通過醞釀已久的改造案，次月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由前駐印度大使羅家倫接任黨史會主任委員。⁶³1952年4月中，中央黨部撥下經費，購買草屯鎮北投里北投巷洪載枋所屬民宅一幢，作為黨史會的辦公處所，往後亦將暫存他處的史料全數遷入，使人員與史料合一，定名為荔園。⁶⁴位於荔園的史庫，由黃寶瑜工程師設計，交交通部所屬新中國工程打撈公司承建，佔地0.5497甲，為鋼筋水泥3層建築，地下室為史庫，1樓為管理與閱覽室，2樓為儲藏室與辦公室，總面積570坪。⁶⁵該樓耗時8年，直到1960年才建成，完工後經蔣中正總裁同意，假紀念國父誕辰名義，同步在臺北國父史蹟紀念館、臺中市政府與荔園舉辦展

62 「黨史會皮藏史料處所防範蟻患情形報告」（1950年7月15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會6.3/242.2。

63 劉維開編，《羅家倫先生年譜》（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頁250。關於中國國民黨改造的醞釀及改造的研究，能參見：王良卿，《改造的誕生》（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陳曉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1950-1952）》（臺北：漢世紀數位，2014年）。

64 〈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購置房產徵詢異議啓事〉，《臺灣民聲日報》，1952年4月19日，版2；劉偉鵬，《汗青一甲子》，頁60。

65 李雲漢，《史學圈裡四十年》（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45。

覽，也邀集中央評議委員、中央委員及學者一同前往荔園參觀。⁶⁶1975年4月5日，蔣中正總裁辭世，陽明山上的中興賓館閒置，黨史會於1979年遂北遷進駐，將其更名為陽明書屋，荔園爾後被南投縣政府相中，收購之後改建為國宅。⁶⁷現荔園已不復存在，僅留下名為「史館路」的路名，能追念當初黨史會在此留下的痕跡。

黨史會在羅家倫先生擔任主委任內，基於史料經過數度搬遷，乃下令製作史料圖書卡片，進行清點與整理工作，其作法按照圖書館編目方式，依據史料性質分類後給予流水號，便利往後的管理與調閱。⁶⁸另也基於黨史會遷臺後，於1953年2月召開的第1次委員會議決議，著手擴大國史資料徵集、建立國父史蹟紀念館陳列室、編輯《革命文獻》等3項主要任務，進行資料擴充、展覽宣傳與史料刊布等工作，爾後也陸續編輯《中華民國史料叢編》，奠定了往後黨史會的基礎。⁶⁹

國史館與黨史會合併的規劃，在政府遷臺之後沒有繼續。1956年5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史館組織條例〉修訂，將國史館位階提升，直屬總統府，掌理撰修國史事宜，由黨史會主委羅家倫兼任館長，國史館方在臺重建，逐漸走出一條與黨史會不同的道路。⁷⁰國史館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陸續於1960年代起，接收來自外交與經濟單位的史料，豐富了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國史材料，逐漸拓展其他歷史議題的討論，使得黨史會作為唯一保存1949年之前國史、黨史資料的地位，有了變化。

66 「臺(49)央秘字第256號唐縱呈」(1960年11月11日)，〈總裁批簽〉，《中國國民黨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案號：總裁批簽49/0196；〈黨史會分在三地 舉辦史料展覽 草屯史庫建築完成 今邀請學術界參觀〉，《中央日報》，1960年11月12日，版3。

67 見〈陽明書屋據點簡介〉，收錄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網站：www.ymsnp.gov.tw/index.php?option=com_tourmap&view=tourmap&id=2&gp=0&Itemid=123 (2015年4月24日點閱)；〈申請耕地變更國宅用地案〉，《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4-1002-0145，入藏登錄號：004000001641A。

68 劉維開編，《羅家倫先生年譜》，頁257-258。

69 劉維開編，《羅家倫先生年譜》，頁268-269、337。

70 〈總統令：修正公布「國史館組織條例」部分條文〉(1956年5月10日)，《總統府公報》，第704期(1956年)，頁1。

伍、結語

史料為歷史研究之本，有了材料才能有史學。

如果說故宮文物瑰寶遷臺，是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中國正統代表的一種象徵，中國國民黨作為中華民國的執政黨，承繼的就是清以來的國祚。中國國民黨中央對黨史會所藏的黨史資料，歷經抗戰與勘亂的搬遷，之所以必須掌握在手，而不使之落入汪精衛政權或中共政權控制，或許也能以黨統的概念來理解。這一批史料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以中國大陸為主體所蒐集的歷史材料，在外交與經濟單位，因為業務所需，尚未移轉1949年之前檔案至國史館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時，為國內曝光度最高的一批資料，透過教學、展示、媒體等渠道，將正統與黨統的脈絡結合，完備以孫中山、蔣中正為軸心的中國現代史論述。

這一批黨史資料遷臺，與抗戰期間黨史資料西遷，都由徐忍茹負責規劃，也因此黨史資料遷臺的過程中，有諸多依循抗戰時期史料遷徙的經驗。包括：

第一、人員與史料分離。史料具有唯一性，如果遭遇攻擊，或將灰飛煙滅，因此黨史會遷徙時都以史料先行，並在史料中排列優先順序，以總理、先進先烈、總裁的史料為最優先，出版品、志書、期刊等在他處或有複本的材料列為最後，甚至存庫房中不動，僅將部份珍稀出版品、期刊攜出。除了押運人員之外，其餘人員則在史料之後移動。

第二、史料木箱裝載，遷徙不求快，通常採地表移動的方式，不搭乘飛機，而搭乘水陸交通工具移動，盡量保持史料的安全。中繼點都設定在長沙，不過國共內戰局面變化太快，蔣中正總裁才決定改以臺灣為最終目的地。

第三、針對空襲的應對方式相近。史料遷徙到一段落，都為了因應空襲而疏散鄉間，抗戰時期遷往城郊，遷臺之後也置放南投草屯，都有避免

空襲使得史料遭毀的用意，且在疏散地也都有複製、拍攝史料的計畫。

《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中，之所以說黨史會史料遷臺毫無損失，所指的應該是經黨史會所管及揀選之後的史料，在運臺過程中並沒有閃失，而並非指涉所有黨部資料完好無缺地運至臺灣。對黨史會來說，最重要的一批史料是總理、總裁與先進先烈的資料，也確實運到了臺灣。其餘目前黨史館所轄各黨部所屬單位資料，乃是黨史會遷臺之後，由各黨部所屬單位移轉、託交，或是徵集而來，並非1949年遷臺時所屬。正因為黨史會能掌握這一批史料，因此在國史館以及其他國內檔案存藏單位未能取得其他史料的情況下，黨史會成了政府遷臺初期，國內最重要的史政單位，一度取代了國史館的功能。

參考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史料》（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 史35/61.8，〈曾介木簽請移交史料箱一冊〉
- 史38/67.49，〈人事室致姚薦楠等留字第195號函〉
- 史38/69.44，〈沈裕民呈關於押運史料及檔案公物赴穗〉
- 史38/70.103，〈第14次委員會工作報告〉
- 史38/70.4，〈第4次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 史38/70.6，〈第6次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 史38/70.6，〈優待遣送家屬名冊〉
- 史38/70.99，〈第13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中國國民黨會議資料》（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 會3.3/82.1，〈三屆中常會60次會議紀錄〉
- 會3.3/95.1，〈三屆中常會73次會議紀錄〉
- 會6.3/171.1，〈六屆中常會第168次會議紀錄〉
- 會6.3/178.11，〈六屆中常會第172次會議紀錄〉
- 會6.3/198.14，〈黨史會鍾孝先等致鄭彥棻函〉
- 會6.3/222.1，〈六屆中常會第217次會議紀錄〉
- 會6.3/235.8，〈39年度黨務經費預算及事業費等增列審查〉
- 會6.3/242.2，〈黨史會度藏史料處所防範蟻患情形報告〉
- 會6.3/242.3，〈中國國民黨致行政院臺（39）秘會第1046號函〉
- 會6.3/242.5，〈六屆中常會第229次會議紀錄〉
- 會6.3/242.6，〈黨史會致中央秘書處天（39）第103號函〉
- 會6.3/42.2，〈黨史會與國史館接收黨政軍各機關檔案辦法草案〉
- 會6.42/183.1，〈中改會四十年總預算〉

《中國國民黨政治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政4/33.1，〈中央黨部縮編問題檢討會決定各項情形〉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01-012070-0007，〈政府機關檔案保存移轉辦法〉

001-014100-0011，〈中國國民黨黨務（三）〉

001-016222-0002，〈國史館沿革史（二）〉

《臺灣省政府地政處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04-1002-0145，〈申請耕地變更國宅用地案〉

《總裁批簽》（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總裁批簽49/0196，〈臺（49）央秘字第256號唐縱呈〉

李雲漢，〈李雲漢致王文隆函〉（王文隆藏）

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常務委員會黨務報告》，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17）。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5年。

陳鵬仁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4）。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9年。

喬寶泰、邵銘煌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員會資料彙編》，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7）。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2000年。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黨史史料編纂工作》，下，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26）。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

二、年鑑、辭典、年譜

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4年。

劉維開編著，《羅家倫先生年譜》。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

三、日記、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李雲漢，《史學圈裡四十年》。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周旋華，《財政與外交工作的回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蔣中正日記》。未刊稿。

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羅家倫先生文存》。臺北：國史館，1981年。

四、期刊、報紙、公報

《中央日報》，1934年至1960年。

《國民政府公報》，1940年3月16日、1946年11月23日。

《教育部公報》，1938年9月30日。

《臺灣民聲日報》，1949年至1960年。

《總統府公報》，1956年5月11日。

伍、專書

中共上海黨志編纂委員會，《中共上海黨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1年。

王聿，《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臺北：商周出版公司，2008年。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

呂芳上編輯，《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1年。

林桶法，《1949大撤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

陳果夫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籌備會編，《陳果夫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1年。

陳曉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1950-1952）》。臺北：漢世紀數位，2014年。

劉偉鵬，《汗青一甲子》。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90年。

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臺北：時英出版

社，2009年。

六、期刊論文、學位論文

沈志華，〈對朝戰初期蘇聯出動空軍問題的再考察：根據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的解密檔案〉，《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2月）。

林宏一，〈封鎖大陸沿海——中華民國政府的「關閉政策」，1949-196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七、網頁資料

〈國史館沿革〉（1998年），收錄於「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web.archive.org/web/19980206010839/www.drnh.gov.tw/ddrnh1/ddrnh1-0.htm（2015年5月23日點閱）

〈陽明書屋據點簡介〉，收錄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網站：www.ymsnp.gov.tw/index.php?option=com_tourmap&view=tourmap&id=2&gp=0&Itemid=123（2015年4月24日點閱）

〈簡介〉，收錄「國史館」網站：www.drnh.gov.tw/Content_Display.aspx?MenuKey=163（2015年5月7日點閱）

上海市沿海運輸志編輯委員會編，〈第二節國內航運企業〉，《上海市沿海運輸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9年），收錄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站：<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421/node67435/node67468/userobject1ai64452.html>（2015年5月24日點閱）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利用處，〈現行查檔範圍〉（2013年12月），收錄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網站：<http://www.shac.net.cn/cdzn/xxcdfw>（2015年5月9日點閱）

The Process of the KMT Party Archives Library and Archives

Moved to Taiwan

Wenlung Wang

Abstract

The KMT Party Archives Library, Academia Historica and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he Academic Sinica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archives in Taiwan. The reasons that The KMT Party Archives Library could achieve the reputation are based on the KMT archives moved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in 1949 and the researchers worked in it.

The ROC government could construct historical concepts by the archives deposited in The KMT Party Archives Library, where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establishing and the process of the state building of ROC. This article constructed by the archives deposited in the KMT Party Archives Library, Academia Historica, and the publications of Government and newspapers to rebuild the process of the KMT Party Archives Library moved to Taiwan in 1949, including staffs and materials. I found the process is similar to moving to Chongqing in 1937.

Keywords: The KMT Party Archives Library, Academia Historica, moving to Taiwan

* The Curator of the KMT Party Archive Library

臺灣文獻

66卷第4期